

绿原先生的一封工作信

□张福生

我初到人文社外文部工作时，绿原先生是欧美组的一名普通编辑，我在苏联东欧组，平时接触不多，只是工间休息时和别的同志一起与他聊聊天，讲讲新闻。我们小辈的年轻编辑喜欢向他讨教问题，他的见解独到新奇，富有哲理，常常让人茅塞顿开，激发你去探索新领域。记得有一次他说，搞外国文学，应该掌握一些《圣经》及《希腊的神话传说》等基本常识，否则会影响工作。那时可能是1980年，整个外文部仅王寿彭有一本《圣经》，还是竖版的，没标点。我去借閱，他明显摆似地拿出来给我看了看，我说他“封锁知识”，他仍旧不肯借出。去苏联学习时，我买到一本插图版《圣经》，很喜欢，就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版，还送给绿原先生一本。现在我成了《圣经》版本的收集者，不能不说是绿原先生当时那句话的结果。

1983年绿原先生担任副总编辑，不久他交给我一部理论书稿。编完后，我将审稿意见连同写给作者的信件一并交给了绿原先生。那时有规定，写给著译者的退改信要经领导过目才可发出。第二天去他办公室，见我那封信已被改得满纸通红。经过绿原先生修改，信文变得条理清晰、言简意赅、据理充分、气韵贯通，完全没有杂乱无序、词不达意的感觉，仿佛我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编辑。

绿原先生那天让我坐到他的对面，笑吟吟地讲述，写这类信的要点是如何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你的意见。此外，信也要成文，气不能散。他的“梳辫子”的比喻让我记忆深刻，越琢磨越觉得生动。

记得当时我向绿原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像这部书稿证明的那样，马列对文艺的论述已形成了一个完整、全面的体系？

我们这一代人对马列著作不熟悉。1971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我曾受命到团部集中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一个月下来，只学到了几个名词术语。

1980年，组长冯南江要我做理论书稿编辑程代熙的助编，帮他编发《马恩论文学与艺术》(二册)和《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册)，主要工作是将所辑的稿文全部校对一遍。工作持续了小半年时间，结束时留给我一种印象：这些辑录的稿文大多数是政治伟人在论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宗教、哲学等问题时涉及到了文学，并非专论，所阐述的也是个人观点。

绿原先生耐心地听完我的话，既没有认同，也没有反对，而是告诉我这种讨论由来已久。他从解放前一直讲到我们要发表的这部书稿。他的记忆力惊人，一些文章的作者、发表的时间，甚至所引用的马列著作的篇名、出处都能脱口而出。最后他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要随便地提出。我把这句话当作一种提醒。那天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绿原先生对马列著作的熟悉程度和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水平是超乎寻常的。

前几年退休回家，有时间整理多年积压下来的旧资料。在一个纸箱底部，我发现了4页绿原先生的笔迹。这个纸箱是1983年程代熙先生调离出版社，到文化艺术研究院去工作时留给我的。绿原先生的这4页纸是写给他的前任上司、时任编译所所长楼适夷和主持外国文学工作的社级领导郑效洵副总编的一封信，写法很像他1965年宣读朱光潜译《拉奥孔》后写的审稿意见，或前文提到的被他修改的那份退改意见。

限于篇幅，仅将此信部分转录：

鲁迅对绿原的生命气质及其诗风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根深蒂固的。

“一切脱离时代重大活动的艺术，缺乏某种历史的中心感，就会把自己降到次要位置”(《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3页)。鲁迅先生有着强烈的历史中心感，做重大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时代需求，所以他站到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制高点上。绿原私淑鲁迅，热切关注“时代重大活动”，这使他的诗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绿原诗歌的呐喊期，其政治抒情诗，是振奋发愤的“霹雳的诗”，主要收集在《集合》《终点，又是一个起点》等诗集中。绿原心灵深处流淌出的诗折射出时代脉搏的颤动，产生过很大反响。走在国统区反压迫、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列的青年学生，曾把绿原的政治抒情诗作为激励自己斗志、鼓舞队伍士气的有力工具。绿原的诗摄下了一个声情并茂的中国，一个摆脱了老调束缚弹起了新调的中国，一个由忍耐而咆哮了的中国，她在受难，然而她很可爱。

绿原的政治抒情诗写于泥沙俱下的时代，呐喊是绿原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特点之一。绿原用像“刺刀一样的诗句”发出喊声：“诗人们呵，/在革命的/沸水里/必须用/烫得起泡的思想斗争/养育/你们的诗！”(《诗人们》)绿原努力要用诗写一部革命史，既不“恐怖自己的影子”，也不“羞耻于接近阳光”。鲁迅在《影的告别》中的信念在这里延伸：“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中沉没。”面对受难的同胞，鲁迅用短篇小说拉开呐喊的序幕，而绿原选择了诗歌，在艺术宗旨的追求上，都希望唤醒沉睡的民众，激励他们，让他们集合起来自救。

在“复仇”这个母题中，绿原和鲁迅在艺术探寻的途中再度相遇。鲁迅的《复仇》表达了对中国人“看客”行为的极度厌恶和对怀着崇高精神从容赴死的耶稣的敬意，并悲悯着暴君统治下的臣民们的前途。那时，地火还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尚未喷出，同胞们的生命尚可在沉暗中延续。“复仇”这个接力棒传到绿原手里的时候，举国上下已经被战争的暴风雨折磨得痛苦难当。“复仇”在绿原诗《复仇的哲学》中“升级”了，因为“我们连一滴唾沫/都没有了，/然而，/这种生活/就是教育”。除了咆哮着的复仇情愫，诗中还不乏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展示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度和豪情：“烈日象征着/我们的生命；/珠琅琅的海洋/在我们面前/豪迈地展望着/它的壮波！”绿原的政治抒情诗，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们仿佛一块块镜子的碎片折射出已逝的历史烟云。

为什么绿原能以从容、宽容的姿态用诗写史呢？这与他热爱祖国、对诗的虔诚是分不开的。绿原说：“最早、最久、最深刻地感染过、震撼过我的，是鲁迅的作品，包括他的小说、散文和散文式的诗《野草》，它们奠定了我对文学的终生虔诚。”在通往诗国的路上，绿原始终是一个挺直

适夷同志：
效洵同志：

最近为了编选歌德诗集，翻阅了一下我社出版的三本《马恩论艺术》，发现里面有不少的误注，误译以及体例上的不当。现将随笔记下的一些较突出的例证列举如下：

卷一：
页82，正文“那我们是不哭哭泣的(uns kann es recht sein)”——按照括弧里的德文意思，这句应译为“那在我们是无所谓的，无乎不可的”或者“那是我们可以同意的”。不知怎么译成“……不会哭泣的”，也许俄译如此，但既然注出原文，译文总应当同原文一致才好。

……
页214，正文，“tres mil azotes y trecientos ……”——西班牙语，即《堂·吉珂德》的原文，误注“法文”。

页240，注文，“……du die Unmöglichkeit eng verbrüderst”意为“把不可能的事情密切地联系起来”，误译为“……实现出来”。

……
卷二：
页31，正文“Amicus Engels Senior ……”——拉丁文，误注德文。

页53，正文“Jacques le bonhomme”法文成语，本意即“乡下佬”，不必再加上“雅各”(同一个名字，前文译成“加斯各”)。

……
页194，正文“……and Swedish armies ……”——“瑞典军队”，注中误译“瑞士……”

……
卷三：
……

页238，正文“Compagnon d’aventure”——法文，意为“偶然相识的朋友”、“萍水相逢的伙伴”；译者按照字面误译为“惊险事迹的伙伴”。

……
至于体例方面，有的注释在文内，有的在页末，有的又在书尾；有的注明原文名称，有的又不注；有的同一词前后注释相矛盾——总之，相当混乱。像这样一部仅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出现了以上这些常识性的、技术性的问题，实在不应该。为了改进今后的工作，特将这些典型例子提出来，供领导上和有关同志参考，请在再版时加以改正。

绿原

1964.2.20

此信中提及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共4册，第1册1959年出版，第2、3册1963年出版。绿原先生指出错误的是这三册，不包括1966年出版的第4册。当时出版这类书籍，要经过中宣部特别批准和严格审查。同绿原先生这封信放在一起的，还有一纸1952年用“中国共产党中宣部”信纸以“周办”(周扬办公室)的名义写的一封公函，是对我社1952年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校样处理意见，附有七页半核校该校样所据版本的书目单。该书以《马恩列斯论文艺》为书名于1953年出版，是“文革”后教育部批准的大专院校通用教材《马恩列斯论文艺》的最初版本。

继承鲁迅传统 学习歌德精神

□黎秀娥

了胸膛的朝圣者，支撑他的正是从鲁迅那里汲取来的“虔诚”。这条贯穿绿原诗歌生命的情感主线，决定了绿原诗的情感穿透力，是对其历史感的有益补充。他用激情将历史重述，将诗中的情感具象化。内心的虔诚在历史的影像中幻化出精神的力量，绿原的诗是心灵的史。走出诗集《童话》中短暂的浪漫漂流后，绿原很快转入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在残酷的战争中，逐渐懂得“一个诗人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从而把诗当成“在苦难和斗争中探索人类精神美的途径和桥梁”，尝试通过“艺术至上”的追求达到“人生至上”的终极理想。如绿原所言，时代、环境和个人性格注定了他不可能钟情于唯美主义，不可能为纯粹而写作，时代、环境和个人性格允许他的是，和鲁迅一样深切关注人生，对祖国、对文学保持一如既往的虔诚。

不惧怕黑暗和孤独，始终从容而执著地前行，长诗《高速夜行车》是绿原版的《过客》。与鲁迅笔下“赤足着破鞋，腋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的“过客”不同，《高速夜行车》中的“你”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把住方向盘盘开了油门启动了你的夜行车”，“向陌生的不可知的无人地带驶去”。相同的是“过客”和“你”其实都是人间匆匆的过客。该诗中“夜游的恶鸟飞过了”“一声冷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语言碎片，不时流露出绿原在艺术气质和精神追求上与鲁迅的暗合。诗之于绿原，犹如杂文之于鲁迅，是用热血写成的，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原自觉地以鲁迅为师，穿过时空的隧道，在文学殿堂里与鲁迅频频相遇，于是有了与鲁迅精神的契合。历史感是他们个体生存体验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虔诚感是他们为文为人品格在作品中的投影，而坚韧感则是更为可贵的气质，显示了鲁迅和绿原个体生命的硬度，这种硬度使鲁迅在无边黑暗中能够作长期的、韧性的战斗；使绿原长期执著于真理，执著于诗，执著于生命的价值。

和鲁迅遭遇的命运十分相似，19世纪下半叶的歌德同样受诸如“悲观主义者”“怀疑主义者”一类的误读，而绿原认为学习歌德精神和继承鲁迅的战斗传统是一致的。人类很多美好精神本来就是相通的，正如歌德对人文主义理想的坚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立人”事业的执著，虽然相隔一个多世纪，各自的经验教训也不尽相同，却不时在人的价值和真理的探求上产生强烈的共振。



绿原

绿原先生第1页文右侧是郑效洵同志的批语：“这个意见甚好，对我们的编整工作大有参考价值。请绳武、永福、代熙同志阅。”批语落款时间即绿原先生送交信的当天。我曾见过郑效洵同志在稿件、报告、书信、审稿意见上的一些批示，“甚好”“大有参考价值”的评语不曾有过。

郑效洵同志是1951年来人文社的创业元老，1956年起任副总编辑。上世纪30年代诞生在“孤岛”的第1版中文全译本《资本论》以及许多早期的马列著作，包括楼适夷根据日文版编译的《马恩论文艺》都是他编辑出版的，他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家。孙绳武当时应该是外文部主任，卢永福大概是苏联东欧组组长，程代熙与马列著作和理论书稿的编辑。看来，绿原先生这封信引起了程先生的足够重视，不然他也不会将其同“周办”的公函放在一个纸袋里，从1964年保存到1983年，以后又留给了我。

信的内容涉及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语、拉丁文和俄文。从没听说绿原先生掌握这么多外语，但想起他的一篇讲述自己1956年至1962年隔离中自学德语的文章《我怎么学的德语》。文中提过他隔离前的外语水平：“我从小学英语，这门功课一直可以；到大学，学了一年法语，基本语法还记得，词汇却少得可怜；解放初期，在一股政治热情的支配下，突击学习俄语，已经学到可以靠字典读懂一些政治书刊”，还讲述了他自学德语的目的：“利用目前大好的空白光阴，把陌生的德语学好，认真读几本马克思经典原著，也好明白自己究竟是怎样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失足的”，也讲到了他的学习方法：“让家里人送来一些工具书和读物，如德汉、德英词典，德英、德俄对照德语语法，以及当时买得到的德、英语版马恩两卷集，和多语版《和平民主报》”，“利用手头工具书把某篇外语课文的意义彻底弄明白，再把它逐字逐句译成地道的母语；然后把课文移开，再把母语译回译成原文。”

这大概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阅读马列原著的方法。我终于明白了绿原先生为什么对马列著作那么熟悉，为什么能够对一套经过层层把关，严格审查，反复校核(据我所知，这种特殊的书稿也要退给译者审核)的马恩经典译文提出如此多的修改意见。

童话诗人」的时空意识

读绿原早期的诗作

□王丽丽



1942年、1943年，刚刚20岁出头的绿原因为“七月诗社”第一、二辑接连推出他的两本诗集《童话》和《集合》而为诗坛所知晓。绿原为什么初出茅庐就被命名为“童话诗人”？诗中所映照的年代似乎与童话所寓指的美好世界相去甚远，读者从诗集中感受到的，更多的是诗人的忧郁、愤怒，以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觉。显然，第一本诗集之所以被命名为“童话”，更多着眼的是诗人创作运思的特点。

童话思维在《花朵》一诗中有较典型的体现。花朵在作者的笔下富有多样的情态，“有轰烈的热烈的花朵/有撒野的风骚的花朵”；诗人想象童真而新颖，他认定这些“说不出的只知道是很好看很好看的”花朵，应该是“从遥遥遥远的青空飞来”的，“该是那些寂寞得发白的星星/悄悄地思凡了/悄悄地跌落了”；全诗热闹非凡，像一幕童话剧，因为“爱花的同志们/都呼么喝六地/成群结队地/欢天喜地地/大惊小怪地/向着旷野/来了/都来了”，“太阳扶着光芒的手杖走来了/牛羊从广场上蹦跳着来了”。童话思维的核心是万物有灵，所以拟人的使用频率很高。准确地说，童话思维压根儿就不存在“拟人”的修辞意识，万物本来就是活灵活现的。在童话思维中，感觉还经常交错融通：“那时是天晚了，/村落里没有灯；/闪亮闪亮的/是河水的声音。”(《这一次》)

1944年，或许是受到了逃避被征调到“中美合作所”而不得不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刺激，原本如童话般思维的绿原迅疾地转向了政治抒情诗的创作。这期间诗风的跨越和改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相当数量的诗歌变成了面向读者直接呼吁和交流的对话体。即如《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诗中所揭露和罗列的社会现实固然是光怪陆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对童话世界的美好期待也随之被否定，相反，作为一种蛰伏于内心的理想，它促使作者观照现实的眼光变得格外严苛和犀利。在诗人的笔下，现实社会明显分裂成了两大极不平等而尖锐对立的阵营：“快乐而自由”的“天国的选民”，以及由“地狱的牧者率领的”“一群哀军”。诗人自然认同于在“这无光的大陆”上“从事反抗和斗争”的后者，并且宣告：“在中国，伟大的诗人们正向你，可爱的读者，写着革命史”。

也是在政治抒情诗中，绿原表现出了对时间和空间超乎常人的敏感。在为抗战胜利而作的长诗《终点，又是一个起点》的题记里，诗人精确地计数着，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日本投降，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抗战的全部日子：“共计八年一个月零八天……”如此刻骨铭心，是因为这一段无比凝重的时间非普通钟表可以铭记，能够对“九死一生的胜利”“计算时间的/只有/我们的/从红变紫，又从紫变黑了/的血呀！/我们的/变白了的/骸骨呀！/我们的/用以突围出来的意志的/痊愈的/粗糙的棱角呀！”诗人将这一段对每一个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都具有非凡意义的时期，表达成了一个非常有质地的空间意象：“我们/渡过了/从奴隶身份到主人身份的/闪电和急雨交加的/狂暴的海峡。”甚至诗的标题也是诗人独特时空意识的凝聚：“终点”和“起点”，既是历史起讫的标志，同时也带有浓重的处所与空间意味。

“炼狱般的时间”的终点，也将是返回家园、重建安宁幸福生活的起点：“我们要/叫家畜同主妇在一起，/叫斑鸠回到桃林唱诗去，/叫白鸫恢复它的笑，/叫马匹到草原去跑”。动物、人，与各自适宜的活动场所的正确配置与和谐组合，就是十分空间化和具象可触的幸福安宁。

民族解放的终点，又是建设现代国家的起点：“时间/以火车的速率/前进着，/我们必须吐掉/过去的唾沫，/咬嚼着未来——/我们要带着/红色的荣耀/用云块似的钢铁/将中国/建筑在/世界大街上，/与北方的大熊为邻”。“使中国的门牌/接着/1945，1946，1947……的号码/改变，/在中国/的门口/插着/路标，/——左通欧罗巴，/——右通亚美利加”。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在全球交往中“表现出/中国的/豪壮的/风度”。理想蓝图的大厦，分别由对时间的瞻顾和对空间的设定来奠基。

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壮丽的时空转换，也使绿原前前的两大诗歌类型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理想正如童话般在现实中展开，“出门就是阳光/阳光又润又甜”；《儿童节献诗·第一天》政治抒情诗也随之呈现出全新的色调，《唱歌的少女》“她唱起来，像花在开放。歌声洒在空中，/有香气四散。”这是一个“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能变成歌”的时代。

如果空间正如现代理论家们所言，是由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塑造，并且是各种关系交互作用的物质凝定的话，那么，它不可能不时时触动诗人原本就分外敏锐的时空感觉。天安门，作为一个铭刻新的“时间开始了”的历史地标，它“站在那里，/望着中国，/望着世界”。“他不讲话”，但“他对一切都有把握”。(《天安门》)王府井既是展示中国人民和丰平裕生活的窗口，更是各民族汇聚和交往的枢纽：“王府井有北京的性格，/亲热、慷慨。”“拥护和平的人/个个称赞王府井，/用各方的口音/各族的口音/各国的口音称赞王府井。”(《王府井的人行道》)

能够更加真切地表达绿原对新的共和国尤其是心脏北京的热爱的，是两首写于1953年的诗，这一年，绿原从武汉调入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在中南海上班。“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我的脚步总是很慢很轻，/我总想在这一带逗留一会儿，/我总是一面走，一面倾听。”“我每次经过这一带，/我的心像喷泉一样/涌出了神圣的火星”。让诗人产生如此虔诚的感情并留恋不已的原因，并不是风景，而是“那里面有一颗伟大的心脏，/是那颗伟大的心脏和我的心脏相连”。(《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

绿原不仅用心去谛听中南海的脉搏，也在《夜里》用心感受北京的呼吸。“在夜的墨绿色的羽纱下面，/我走着……”走过“最后一班电车空着回站了”的大街，走过彻夜不眠的火车站，同时也走进了有趣并已经睡着了胡同。“沾着每一家的窗口走过，/我听见人们的均匀的呼吸，/像听见了北京的呼吸……”

诗人之所以对新的社会产生了真诚的颂赞之情，是因为真切地感受到了千年古国正在发生着的深刻而迅捷的巨变。在《火车在旷野里奔跑着》一诗中，作者坐在代表着新中国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上，“凝视着旷野和它的表情”，内心的思绪也如火车般奔腾不息：“旷野几千里都是一样的，/但每一寸有每一寸的轶事；/旷野几千年都是一样的，/但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奇迹。”

在绿原写于1950年代前期的诗歌中，《小小十年》显得例外地理性与平实。该诗是作者自己锡锡的纪念，其中道出了一些婚恋的真谛，比如“十年前，我们开始相爱/我们并不懂得爱情/就像小学生不懂得语法/第一次学做‘作文’”。最耐人寻味的是该诗的结尾：“时时给生活添点苦碱吧/爱情才不会由甜变酸”。这本来是一则爱情保质的箴言，但谁也未曾料到，作者的人生确实还有一段像苦碱一样的时期等待着他去历练，而这一段无可复制的生活阅历与体验，还将把诗人的时空意识锻造得更加精纯，使之进一步跃升到哲学的高度，并最终成就他写出撼人心魄的诗。